

評論 大陸 女人沒有國家？ 深度

## 弦子：上野千鶴子時代的女權主義者，如何面對被「成功婚姻」挑戰的女權敘事？

上野千鶴子曾以為婚姻制度會在她的世代裏結束，可父權制對女性的吸引力卻順利延續了下去。



全嘻嘻微博的視頻。圖：影片截圖

弦子 | 2023-02-26

弦子 評論

「女人沒有國家？」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符雨欣。看似私領域的婚姻，指向的是問號背後、「國家」之外的另一個制度壓迫，一個不可能完全離開國家的語境、卻又對所有女性具有共性的制度。這幫助我們想像女性身上的種種桎梏之網的複雜性。

### （中國女性主義者、發聲者、寫作者）

超越了上野本身觀點所引起的關注，up主全嘻嘻與上野千鶴子的對談成為又一個性別議題的討論熱點，全嘻嘻在視頻裏塑造了一個婚姻幸福且對女權主義抱有追求的精英女性形象，這引起了普遍的質疑：她的婚姻是否真的幸福、自身婚姻幸福的女性是否看不見結構性問題、在上野教授面前討論婚姻是不是在浪費機會？

這三個疑問真正在問的問題，其實是全嘻嘻本人是否幸福/有資格成為女權主義者/她應該問什麼，輿論討論也因此無可避免地聚焦在了對全嘻嘻個人的批評——對個體的過分關注，往往是公眾自身焦慮的情緒性投射。

全嘻嘻的視頻顯然有討論的意義，意義並不在於她本人如何試圖通過上野千鶴子的觀點達成邏輯自洽，而在於女權主義者能否在面對這樣一位精英女性與她所代表的處境時，達成自身的邏輯自洽。

但針對作為個體的全嘻嘻的三個問題，需要回答的恰是關注此事的女權主義者自己：女性是否可能在婚姻中獲益/女性贏家的出現是否改變了父權制結構/女權主義者對父權制的反叛要往何處去？





《北大宿舍聊天x上野千鶴子 | 只要自由地活著，怎麼樣都可以》。圖：影片截圖

## 全嘻嘻真的不幸福嗎？當進入婚姻比單身幸福

通過外在的物質與內在的精神，父權制以懲罰單身者、懲罰弱者的方式給參與者提供資源，這正是父權制得以長久延續的原因。

兩張盛傳的對話截圖成為全嘻嘻「婚姻不幸的罪證」：她因為老公的反悔而推翻丁克計劃、在老公考慮購買性服務時選擇自我反思。可這顯然違背了一種常識：這並不是一個弱者會受到追捧的社會，任何人都無法僅僅通過不幸得到關注。

作為一個符合主流社會標準的中產精英，全嘻嘻能在全平台收穫流量的原因，恰好是在於她極為坦誠地展示了自身的慾望：如何在一個人人焦慮的環境裏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兩張截圖不過是追求中必不可少符號，象徵着困境的存在與被超越，她因此做到了對慾望最充分的展露——困難源源不斷，慾望永無止境。

全嘻嘻在自己的欄目裏向受眾詳細展示了困境如何被克服的實際操作。以家庭對女性職業發展影響最大的育兒勞動為例：全嘻嘻拒絕任何育兒與家務勞動，具體描述是「一整年和女兒單獨相處的時間只有十幾個小時」，她在生產第五天後回到職場，將育兒勞動完全交給丈夫與丈夫的母親，丈夫的母親從事育兒與家務的雙重工作，得到一個月幾千的「工資」作為回報。同時，全嘻嘻也確實做到了在有一份全職工作的同時運營了一個有大量產出的自媒體欄目，這樣的工作強度佐證了她陳述的可信性。

在全嘻嘻與丈夫的對談中，男方反覆提到的一句話是「家庭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全嘻嘻提到的則是「個人職場發展」。家庭作為一個整體要追求利益最大化，這顯然是父權制家庭在過去要求經濟上處於弱勢的女性為男性提供無償勞動的藉口，然而當女性在經濟上足夠強勢時，「家庭利益最大化」與「女性個人發展」的達成了目標上的統一，在這樣的條件下，全嘻嘻擁有了與父權制家庭共贏的物質基礎。

上一個十年，大陸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互聯網行業、自媒體行業、影視行業、教培行業等行業處於風口，這些新興行業的生產模式，相對來說給予了女性一個比過去公平的職業賽道，經濟產業結構的變革製造了數量相當之多的職場女性精英，而傳統家庭內部性別分工的不公平作為一種知識概念，通過女

權運動在女性中得到了基本的普及，與此同時，依然存在的傳統家庭代際關係，為年輕一代父母將自身需要承擔的育兒勞動以最低廉代價轉嫁給上一代女性，提供了可操縱性。

全嘻嘻代表了一種可以說是大陸精英女性所獨有的，在婚姻中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操作：家庭外部的職業發展是經濟基礎、家庭內部的代際關係作為解決方式、進步的性別觀念提供道德依據，三者缺一不可，女性由此將自己在婚姻中的損失降到可能性的最低，即完成了收益大於損失的實現。

何為收益大於損失？全嘻嘻在視頻裏這麼說：「你的財務達到安全之後就會覺得有一個伴侶更好，因為他會照顧好你的生活且提供情緒價值」，這句不經意的慾望坦白是重要的，解釋了為什麼在自由市場與經濟轉型給當代女性提供了經濟上的資源後，為何依然有女性願意走入婚姻，父權制的堅固在於一整套精密的制度設計，而這套設計亦在隨着時代變化自我調整——

經濟。在過去，沒有繼承權與就業權的女性必須通過進入婚姻，給男性提供無償的家務與生育勞動才能獲得生存資源，相當長的時代裏，這是女性的唯一選擇，與其說進入婚姻是為了獲得利益，不如說不進入婚姻會有無法承受的懲罰。而當下，在房價與戶籍制度的設計面前，擁有更多資產才可以抵禦風險與損耗。中產家庭意味着經濟上的合併，雙方組合得到一線房產、投資、現金流等穩定的資產組合，單身者則要承擔更大的損耗。通過制度的設計，父權制以將資源完全集中在制度之內的方式，引誘人們服從自己，當單身的年輕人們選擇躺平這樣對父權制的消極抵抗時，中產家庭則期待着「財務自由」，父權制的服從者清楚自己可以從中獲得更多資源。

精神。如果我們認識到父權制給社會製造着災難與暴力，一個主流價值取向極度單一的社會本身就在給人們的精神帶來傷害，就不得不承認情緒價值的珍貴，當一段可以提供穩定情緒價值的關係成為壓力之下人們的生存前提時，不計代價的希望將這段關係綁定也是人之常情。婚姻制度則暗示性緣關係可以讓人們綁定一個對抗焦慮的幫手，從而有更多精力參與到對社會資源的爭奪中去。當女性和男性一樣擁有社會關係後，女性也和男性共享了對性緣關係的渴望。

當一部分女性通過個人能力與時代風口改變了自身的弱者處境時，父權制給予她們的幻覺，即女性已經改寫了父權制利益分配的機制，因為自己贏得的利益更多。可事實上，父權制以懲罰單身者、懲罰弱者的方式為參與者提供資源，以完成自身的存續，在時代變革之時，精英女性正是被父權制為自身存續所精心挑選出的勝利者。







up主全嘻嘻。圖：網上圖片

## 菁英女性成為贏家，父權依然是最後的獲利者

當一部分女性從父權制中得到更多分紅的時候，家庭作為一種最小的統治單位反而得到了鞏固。

在一個性別議題與公共議題的討論空間不斷坍塌，女權主義者在追求結構改變的過程中屢遭打擊的環境裏，結婚率與生育率的降低在事實上展現了女性對父權制的對抗。拒絕進入婚姻與生育，成為在當下的社會空間中，女性最底線也是最重要的抗爭手段。在指出婚姻制度問題的前提下，女權主義者的反婚策略是訴諸個體的情感動員——「進入婚姻的女性一定會被男性剝削」。

然而這樣的敘事顯然因為精英女性的贏家身份被打破了，這在社群內部製造了焦慮，矛盾與討論也由此而來。

女權主義者寄希望於建立更加多元、公平的關係模式來瓦解父權制，卻忽視了在父權制對婚姻制度的分紅之下，進行內部博弈給自己爭取更多利益本身也成為了一種誘惑。異性戀婚姻的誘惑不是公平，而是在家庭單位內部為個體提供了博弈勝利、慾望無限擴張的可能。全嘻嘻對婚姻的慾望是對方為自己持續並穩定地提供生活上的照料與情緒價值，對方則趁此提出自己的要求：子女。雙方都為自己的慾望做出了妥協，妥協證明的正是慾望的強烈。

全嘻嘻對自我慾望的暴露與實現，演繹了當女性的內心慾望與個人利益高度統一，即最高效率地得到世俗成功時，她有相當把握從父權制中得到好處，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女性不再是通過婚姻向男性乞求資源，而是追求以個人能力在社會層面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家庭的價值是讓自己的奮鬥之路持續化且穩定。

全嘻嘻不是個例，當公共視線裏出現越來越多事業成功的女性時，我們不難發現傳統的父權制婚姻發生了改變，女性渴望得到主流價值上的成功，女性對成功的渴望也給父權制提供了新的存續機會。

事實上，值得討論的並非個體是否幸福，在一個主流價值觀極其單一的社會，幸福無非是父權制給主流群體所提供的生活模板，吸引人們自願加入而延續父權制的統治，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即使父權制家庭有功利主義的價值，其存在就必然合理嗎？

在上野千鶴子的《資本主義與父權制》裏，她解釋父權制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以生產方式的角度，「父權制是男性對女性勞動力的統治，女性在家庭內部所從事的再生產勞動被社會剝奪了價值」。在全嘻嘻與丈夫構成的家庭內部，父權制的剝削事實上依然存在：上一代的女性在這個家庭裏承擔了絕大部分的育兒與家務勞動，得到的報酬卻遠遠低於市場價值（即使是市場價值也存在着對勞動者的剝削），進入中產的中年人可以對上一代的女性進行剝削，依靠的是城鄉二元發展所帶來的不平等，以及依然有女性被愛與道德的名義綁架，不得不在家庭內部進行無償或得不到應有回報的再生產勞動。

對女性再生產勞動價值進行剝削的基礎還在於，父權制將家庭內部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需要不斷強調共同體的利益最大化，即使家庭中的女性得到了育兒與家庭的解放，家務勞動依然必須有人承擔，承擔者被排除在利益共同體外部，其犧牲也變的合理化，於是女性的再生產勞動也有可能被其他女性貶低。

這依然是父權制的陰謀，通過有限且嚴格的利益分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必須是婚姻制度內的異性戀性緣關係，人們無法通過其他方式連接起來，正如女性之間也缺少統一的動員機制，這就為父權制的延續提供了管理的基礎。

即使是一個精英女性可能成為贏家的婚姻裏，父權制依然是最後的獲利者：女性的再生產勞動得不到價值

承認，男性對女性勞動力的統治不會得到結構性的改變。當一部分女性從父權制中得到更多分紅的時候，家庭作為一種最小的統治單位反而得到了鞏固，上野千鶴子曾以為婚姻制度會在她的世代裏結束，可父權制對女性的吸引力卻順利延續了下去。



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圖：網上圖片

## 未婚女性與已婚女性的分化，女權的困境

被分化的已婚女性與未婚女性，都認為彼此境遇的區別是因為自己的選擇，父權制的分裂便在此刻達成，因為對個人選擇的推崇正是對結構性問題最大的忽視。

全嘻嘻承擔了公眾的道德審視，可真正面對難題的卻是女權主義者自身：父權制的運作如此複雜而精密，輿論指責父權制是在製造剝削的情感動員出現了瑕疵——這樣的動員解釋不了為什麼大多數人依然要選擇走進這個制度。

僅從一個個例，女性感受到了挑戰父權制的艱難——反叛的生活並不能給參與者提供多少資源，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被父權制牢牢把握的時候，女權主義者的集體行動面對了最大的困境：集體行動變成了一種道德上的選擇，卻不可能讓所有人遵守統一的道德標準，這似乎預示着女權主義者有着永遠無法抵達的界限，無疑讓參與者感到焦慮。

公共平台上，性別議題的關心者對力證全嘻嘻的不幸表現出了驚人的狂熱，並積極的試圖將不幸歸結出她個人的原因：高等教育的失敗、異性戀女性的軟弱、戀愛腦、揹負着精英女性的標籤而不願意承認自身的挫敗。將所有進入婚姻的女性想象為犧牲者，將她們的犧牲歸結於自我選擇的不明智。

這套敘事在近年成為女權議題中的主流，使用者自信地認為自己可以通過不進入婚姻的方式成功逃逸，擺脫被操縱的命運。人們迷戀於女權主義可以讓自己做出正確選擇的自我賦權，在女權議題的討論被不斷緊縮，聯繫與行動變得愈發困難的當下，自我賦權幾乎是女權議題唯一能給個體所提供的正向情感回饋。

可惜的是，這並不是事實真相，當女權主義者堅稱遠離婚姻便可以擺脫剝削，不婚必然比已婚幸福時，便忽略了制度設計的目的正是操縱人們的選擇，父權制依然佔領着這個社會的主要資源，男性統治着女性的勞動力，整個制度是為已婚者設計的，因而主流生活外的資源極其有限，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普遍性地存在，可不婚也無法擺脫普遍性地懲罰。

女權主義者的困境正在於此，一勞永逸的完美選擇並不真正存在：女性始終需要不斷為自己的選擇承擔風險與代價，在自我的邊界與對正常生活的渴望中游離。這套機制獎勵順從自己的精英，讓大眾從中爭奪剩餘的利益，這套機制懲罰弱者，懲罰一切不服從的人。

每當全嘻嘻為代表的女性贏家出現時，父權制對女性再生存勞動的普遍剝削便得以隱身，每當女性想象可以通過反婚的方式徹底迴避被磨損的命運時，父權制對反叛者的懲罰也得以隱身——人們幻想存在解決困境的完美答案時，結構性的操縱就在此刻逃逸。

無論是全嘻嘻為代表的父權制贏家對未婚女性處境的無視，還是未婚女性迫不及待將已婚女性想象為受害者的焦慮，在本質上都是因為父權制要求女性為自身的選擇負全部責任——女性在這個制度裏得不到任何外部支持。對「完美女權者」的焦慮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為大眾情感的投射，當性別議題被一個個噤聲，只剩下婚育議題留在社交平台時，個人選擇成為最後的指望。女性急於得到一個標準的實踐，讓標準的實踐解決所有人的困惑。

將未婚女性與已婚女性進行分化，恰好是父權制長期進行的操縱：讓已婚女性成為一個男性的利益共同體、未婚女性則缺少建立多元連接的社會支持。父權制千方百計對女權主義進行打擊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女權主義提供了對抗父權制的標準答案，正是女權主義試圖給女性提供更多連接的可能性，以連接降低女



性在不同選擇中受到的懲罰。

被分化的已婚女性與未婚女性，都認為彼此境遇的區別是因為自己的選擇，父權制的分裂便在此刻達成，因為對個人選擇的推崇正是對結構性問題最大的忽視：父權制之所以能得到絕對的權威，不僅是因為給參與者好處，更是因為分配機制的不公平。



《北大宿舍聊天x上野千鶴子 | 只要自由地活著，怎麼樣都可以》。圖：影片截圖

## 個體焦慮來自對結構性改變的幻滅

當女權主義作為一種進步話語，也可以被父權制的贏家用來將個人主義包裝為「自由選擇」時，女權主義者指出了主流的這套幸福是因為順應了父權制的剝削機制才可以輕易獲得。

對個體選擇的無限焦慮，正來在於對結構性改變的幻滅，這種幻滅也同樣是父權制的陰謀。當女權主義者認定女性只能成為婚姻中的受害者時，家庭作為維繫父權制統治的最小單位這一觀念深入人心，可父權制的危機也在此隱身。事實上，作為進入父權制的標誌，家庭也成為父權制必須承諾利益分配的最小單位，當承諾無法兌現時，最小單位的家庭與家庭中的個人，便因此擁有了瓦解父權制的權力與合法性：在九成新婚家庭面臨負債的韓國，有近半的新婚夫婦拒絕生育，而「最後一代」這個振聳發聒的宣言，同樣來自

新家庭面臨真實的挑戰，但他們的新家人卻拒絕工作，而「救救自己」是他們最優先的目的，因此不自於當一個家庭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被打破時，決定從父權制撤出的時刻。在這樣的瞬間，一個牢固的家庭也同樣擁有瓦解父權制的勢能。在這樣的瞬間，不同身份的人們得以重新連接。

主流的中產家庭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試圖得到道德上的免責，這是人人爭做完美女權主義者的最大動機，父權制所爭取的同樣是道德上的免責，讓人們內化自己遭遇的不公與不幸，以避免統治的危機。即使女權主義者擁有的只有話語與常識，力量恰在於此，道德上的免責被打破，被極力掩蓋的不公才得以顯露。

當選擇從主流生活進行反叛的時刻，女權主義者在代替所有人承擔着不應有的懲罰，可驅逐女權主義者的父權制也將為此付出代價，當女權主義者擁有了對這套體制的審視視角，去辨別這套機制究竟是如何運行時，牢不可破的假象下便存在着危機。當女權主義作為一種進步話語，也可以被父權制的贏家用來將個人主義包裝為「自由選擇」時，女權主義者指出了主流的這套幸福是因為順應了父權制的剝削機制才可以輕易獲得。

通過將大部分人不斷放置在作為道德與利益的衝突之中，不公平的機制讓人們彼此不斷分裂、彼此指責。這樣的分裂並非女權主義者造成，卻讓父權制成為永遠的既得利益者，對結構性改變失去期待的人們只剩下對個人主義或道德追求的狂熱。女權主義者的機會正在於彌合個體的分裂，去創造新的連接，如果這是父權制所反對的，那也一定是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運行機制所恐懼的。

上野千鶴子時代的女權主義者們，通過對無償勞動的指認逼迫父權制的坍塌，可父權制以自我改造的方式選擇了新的贏家，試圖引誘女性放棄對公平的追問，去進入這套機制、複製這套幸福。面對這樣誘惑，要做出怎樣的選擇，是這個時代的女權主義者們最珍貴的權力。